

# 戰中之戰：抗戰時期 江蘇西北鄉紳的抉擇

• 張 雷

**摘要：**本文利用地方資料研究抗日戰爭時期江蘇徐州豐縣西北村寨的鄉紳以及地方近代化的過程。自咸豐、同治年間的捻軍之亂以來，當地鄉紳以寨子為基礎，凝聚家族和社群，強化自衛和自治。及至抗戰初期，鄉紳在王獻臣、共產黨和國民黨三方勢力之間觀望，在抗日與自衛之間徘徊。1938年12月，歸順日軍的王獻臣主力被國共雙方聯手殲滅，鄉紳在自衛邏輯下全面投向國民黨，組建區常備隊抗日，但隨即在1939年5月被日軍圍殲，死傷慘重。失去地方精英支持的國民黨勢力在鄉村岌岌可危，共產黨則乘機代替鄉紳建設鄉村政權，形成兩套行政體系，加劇國共之爭。1940年6月，國共雙方在豐縣西北短兵相接，國民黨勢力被驅逐，殘餘鄉紳逃亡他鄉，地方精英構建的「保護型經紀」統治體系逐漸被政權武力移除，為中共在江蘇北部建設紅色鄉村創造了條件。

**關鍵詞：**抗日戰爭 江蘇豐縣 寨圩 地方精英 淪陷政治

1939年1月25日清晨，江蘇省徐州豐縣西北境一座名為鬼莊的寨子外，三百多名日軍在四角架上輕重機槍、寨門口支上大炮，肆意洗劫村莊。日軍一共搶走44萬斤麥子、38頭驢牛、130隻青山羊、200隻雞鴨、16幅鄭板橋等名家書畫和10箱紫銅佛像。搶劫之後，縱火焚燒全村一千多間房屋，佔地380畝的鬼莊寨變成一片焦土，寨主的三十間磚瓦樓房也未倖免於難，成為名副其實的「鬼莊」<sup>①</sup>。鬼莊寨於1858年由渠氏家族修建，正值清朝咸豐、同治捻軍之亂（捻亂）期間（1853-1868），寨牆周長450丈，四角各有一座炮樓，只開一個東門，內外挖有三道壕溝，居民以吊橋進出<sup>②</sup>。日軍此次只是放火搶

\* 首先，感謝鄉黨劉文忠、許硯君、田效民、高昌忠諸先生，以及張言俊、時念元、時念民、劉元秋、崔亞軍、許正尚、李飛、張穎的幫助。其次，感謝香港嶺南大學 Faculty Research Grant (101894) 的支持。筆者生長於其中一座村寨，現在人煙零落，恐又要歸於荊茅之地，特以此文紀念，冀小村青史留名。

劫，並未殺人屠村，更像是一種示威性的警告，因為剛佔領豐縣的日軍意圖威懾鄉紳，而非斬盡殺絕。這是鬼莊寨自捻亂以來首次被攻破，開啟鬼莊、茅莊、便集（以下統稱「西北三寨」）以及鄰近村寨淪陷的序幕。

傳統的抗戰史研究認為，抗戰模式大致是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抗敵，共產黨在敵後戰場游擊、建設根據地，而地方社會則作為動員和犧牲的對象，成為戰爭的背景 (backdrop) 而非角色 (actor) ③。近三十年來對淪陷區的研究發現，抗戰並非是黑白分明的民族主義對抗帝國主義，對眾多當事者而言，對抗或合作只不過是一種生存策略④。不過，淪陷區研究仍遵從一種自上而下的敘事模式，而且多限於城市⑤。相對城市，淪陷區的鄉村並非只有民眾和日軍兩個角色，同時還有國民黨或共產黨，或者兩者兼有，其複雜性和曖昧性往往甚於城市。

美國學者西波特 (Peter J. Seybolt) 研究河南 (豫) 北部內黃縣的抗戰，指出此縣的戰爭多在中國人之間而非中日之間展開，這種混戰消解了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損害了地方精英，起初利於日本的佔領統治，最終幫助中共掌控地方；吳應銑則檢討了抗戰期間河南鞏縣的鄉村聯防力量與中共的分合⑥。事實上，豫北鄉村在抗戰前已經失序，而且由於鄰近中共根據地，共產黨勢力較強，國民黨勢力較弱。與河南鄉村相比，抗戰前江蘇 (蘇) 北部的鄉村社會並未失序，地方精英以寨子維繫鄉村秩序。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與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都曾注意到近代江蘇、山東 (魯) 交界地區穩固的士紳力量，可惜兩人的研究均未觸及抗戰時期⑦。抗戰之後，共產黨在蘇北崛起，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也並未撤離，在鄉間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本文以蘇北豐縣的三個互保村寨為例，將抗日戰爭地方化的現象呈現出來，在日軍、共產黨和國民黨三足鼎立之勢下，探討鄉紳的生存之路與村寨權力變化，以及地方近代化的過程，揭示淪陷區鄉村的複雜面相。

本文並非以共產黨或國民黨視角寫鄉村，而是以地方視角書寫淪陷區的鄉村政治，主要依據中國大陸和台灣所存史料：一是大陸的方志、族譜、村史、政協文史資料以及中共地方黨史；二是豐縣旅台同鄉會於1977至2011年間出版、每年一期的《豐縣文獻》，主要刊載豐縣赴台人員撰寫的人物回憶、紀念文集、歷史掌故、家鄉禮俗等；三是《黃體潤日記》。黃體潤 (1896-1996)，字玉山，江蘇豐縣人，是國民黨豐縣地方首腦人物，歷任國民黨豐縣黨部監察委員、豐縣教育局長、代理縣長、豐縣保安旅副旅長、豐縣勘亂建國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1949年去台。豐縣檔案館所藏的《黃體潤日記》詳細記錄了自1933年6月至1949年12月豐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情況，是江蘇省唯一由國民黨縣級官員撰寫的地方日記⑧。

## 一 陷落前的豐縣村寨

1930年夏，一位調查了蘇北各縣的訪問者直言：蘇北鄉村是「封建的部落經濟」，因為「人民的生活的單位是各個『土圍子』或說是『寨』或叫做『集』或叫